

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地方化^{*}

——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例

韩 戍

内容提要 抗战军兴,上海光华大学在成都设立分部。分部校政由光华旧人主持,创办经费多得川人捐助,校董亦大半川籍。光华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毫无渊源,政府资助不足,学校只得征收高额学费。征费之举引发学潮,川籍校董邓锡侯、向传义等地方势力支持学生,并顺势接管学校。从此,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成为一所地方化的学校,并于其后被改组为成华大学。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与地方高校的国立化路径相反,实为地方针对内迁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育权力之举,研究此一问题足以加深对战时中央、地方以及内迁高校三者关系的认识。

关键词 中央 地方 内迁高校 权力斗争

关于抗战时期的大学史研究,已有极多成果问世。其中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者,多注重中央对地方的影响,或地方高校的“国立化”进程。王东杰在研究四川大学的著作中,将川大视为中央与地方争夺教育权力的场域,展现了抗战前后中央逐步扩张权力,使川大摆脱地方势力控制,实现真正“国立化”的过程。王春林在研究东北大学的论文中,考察了西安事变后中央为彻底解决东北地方势力,以停发经费、迁移改组的方式强行将东北大学改为国立的始末。汪伯轩在研究陈立夫与战时高等教育的学位论文中,讨论了分别控制在阎锡山、刘湘之手的省立山西大学、重庆大学,如何经数次学潮而最终改制国立,被教育部实质掌控。^①对于地方势力针对内迁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育权力的一面,一般未被研究者注意,尤其缺乏细致入微的个案描述。^②

本文将地方势力针对内迁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育权力的行为,命名为内迁高校的“地方化”。这里所说的“地方化”,与教育学研究中常用的“地方化”概念迥异。在教育学领域,“地方

^{*} 本文承蒙许纪霖、冯筱才教授,胡悦晗、赵峥学兄及匿名审稿专家指点,特此致谢。

^① 王东杰《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: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(1925—1939)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;王春林:《中央与地方的角力: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的国立改组》,《史林》2012年第4期,第136—145页;汪伯轩《陈立夫与战时中国高等教育》,硕士学位论文,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,2012年,第166—171页。

^② 目前仅见学者注意到西南地方势力为抵制中央政府的渗透,对内迁高校师生批评国民党的言行予以保护,参见易社强著,饶佳荣译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,台北,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100—104页。

化”主要从高等教育的“在地化”“功能化”角度考虑,认为高等教育以地方财政拨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者,管理权应归属地方,为地方的科教文卫事业服务。^①不同于教育学肯定所谓“地方化”的“正面意义”,本文所讨论的“地方化”,主要和权力斗争及地域意识有关,指地方势力通过对内迁高校的实质性控制,或将其改制为地方性大学,以掌握更多的教育资源,直接或间接与强势的中央抗衡。

本文的研究对象——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即是内迁高校“地方化”的典型案例。本文将梳理成都分部的办学史事,展现其从内迁高校转变为地方性大学的来龙去脉,并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:抗战时期的内迁高校中,哪种性质的学校最可能被“地方化”?何种主客观原因导致内迁高校的“地方化”?地方势力一般通过何种手段使内迁高校“地方化”?中央对内迁高校的“地方化”持何种态度?为何会持这种态度?本文希望通过解答这些问题,揭示与地方高校“国立化”相反的另一面,以加深对抗战时期中央、地方社会以及内迁高校三者关系的认识。

一、光华人内迁成都与地方底色

1937年夏,八一三事变爆发,战火蔓延到上海。为避免学校陷入敌手,各大学纷纷播迁内地。国立同济大学凡六迁,落脚于四川李庄。国立交通大学先入租界办学,后内迁重庆九龙坡,并由分校发展成为总部。^②对于所谓私立大学“四大金刚”——光华、复旦、大夏、大同,教育部命令组织联大筹款西迁。光华不愿加入联大,谓“教师分配为难”并要求退出。大同亦随之退出联大。^③其后,复旦、大夏两校在庐山、贵阳两地合组为复旦大夏第一、第二联合大学。光华、大同选择留守沪滨观望。

大西路光华大学校址处于中日交战地带,校长张寿镛^④决定将学校暂时迁入租界办学。11月12日,日军将光华校产全部炸毁。张寿镛与在沪董事决定,聘请入川主持正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商学院院长谢霖^⑤为光华大学副校长,委托其全权组建成都分部。11月25日,筹备处成立,由正则职员苏祖南、刘佑卿、王镜蓉、祝正因及光华校友林树湘、郭基荣、黄德清义务办理其事。谢霖邀请光华创校元老薛迪靖担任教务长,旧部陆寿长、李恩廉担任总务长、注册主任,校友胡毓杰、伍丹戈担任院长和系主任。谢霖以光华旧人组建起新的行政班底,并租赁成都新南门内王家坝街房屋为临时校址,于1938年3月1日正式开课。^⑥

私立大学财政基础薄弱,依靠社会力量办学。抗战中校产全毁,更需要中央的财政支持。上海时代,光华以虞洽卿、钱永铭、王省三、朱吟江、赵晋卿、许秋帆、陈光甫等江浙绅商为校董,政界背景不深。校长张寿镛曾官至财政部次长,与蒋介石颇有私交。不过,张寿镛与国民党并无渊源,实因理财能力卓越受到蒋介石重视。1932年张寿镛辞官后,基本失去价值,在政治上已经边缘化。^⑦此时对张寿镛而言,欲谋求中央的支持主要有两个渠道:一是旧日同僚孔祥熙(财政部部长)、朱家骅

① 潘懋元《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地方化的理论探讨》,《潘懋元文集》卷3,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,第66—67页。

② 苏智良等《去大后方——中国抗战内迁实录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,第252—256页。

③ 林美莉编校《王世杰日记》上,1937年9月26日,台北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,第48页。

④ 张寿镛(1875—1945),字咏霓,号约园,浙江鄞县人。北洋时期历任浙江、湖北、江苏、山东财政厅长,江苏沪海道尹。1925年9月,参与创办光华大学并担任校长。1927年4月,受蒋介石征召,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、财政厅次长,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。1932年7月辞职,专任光华校长直至逝世。

⑤ 谢霖(1885—1969),字霖甫,江苏武进人。中国第一位注册会计师,历任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总会计师,中央银行秘书长。1932年9月起担任光华大学商学院教授、院长。1938年受命创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。

⑥ 《成都分部十年大事记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光华大学1947年编印,第57—58页。

⑦ 俞信芳《张寿镛先生传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,第100—134页。

(中央组织部部长) 二是儿女亲家翁文灏(行政院秘书长、经济部部长)。成都分部筹备处建立后, 校方在重庆设置“光华大学移川复兴建设委员会” 敦请孔祥熙为名誉委员长, 加聘朱家骅、翁文灏为校董, 负责替光华募款。

从孔祥熙、翁文灏、朱家骅的权位来看, 此时光华的政治背景已不算弱。建校初, 三人也确实为光华筹款而多方努力, 如孔祥熙资助 3 万元用于校舍兴建, 翁文灏捐助建校基金若干, 朱家骅则成为光华向教育部索款的中间人。不过, 孔祥熙本人与学校毫无渊源, 相助多是象征性为之。翁文灏虽然是张寿镛亲家, 却也不可能将学校当成自己的事业。^① 朱家骅位居中央组织部部长, 抗战中垄断大量资源, 势力庞大甚至自成一系。然而, 朱家骅与 CC 系领袖、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虽然表面关系和谐, 实则分庭抗礼, 激烈争夺权势资源。孔祥熙、翁文灏两人作为政学系领袖, 也深为 CC 系所忌。^② 这种微妙的关系意味着, 虽然光华也能够得到教育部的财政支持, 但资助常打折扣。

1938 年 6 月, 张寿镛入川视事, 看到光华经济困顿、财政无着的窘境, 认为在中央之外, 必须获得地方社会的实质性支持, 承诺抗战胜利后成都分部永久留川, 造福地方社会。由此, 校方逐步增聘四川政商两界的实力派担任校董或驻川常务校董, 其中包括邓汉祥(代理四川省省长)、邓锡侯(川康绥靖公署主任)、甘绩镛(四川省政府委员兼财政、民政厅厅长)、缪秋杰(四川省盐运使)、康宝志(四川省粮食局局长)、杨培英(四川聚兴诚银行董事长)、张仲铭(前川军师长、实业家)、向传义(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长)、李肇甫(四川省政府秘书长)、刘航琛(川康平民银行董事长)、徐堪(川籍行政院粮食部部长) 等人。^③ 随即, 光华开始向各位川籍校董募捐以新建校园。其中, 张仲铭兄弟捐赠田地 50 亩作为校址并认捐学生宿舍 1 座; 刘湘(已去世)、邓汉祥、甘绩镛各捐教室 1 座; 康宝志捐助 1 万元建筑图书馆; 自贡自流井富荣盐场全体商人捐助建筑经费 2 万元; 四川省政府准许办校用地免征田税, 并拨款 5 万元用于学校迁建。光华方面为回报川籍捐赠者, 将教室、礼堂、图书馆、宿舍皆冠以捐助者之名。^④

内迁各校中, 国立大学有政府常规拨款资助, 且代表着相对于地方的“中央”, 不必依赖地方社会。而且, 随着强势的中央内迁, 控制于地方势力手中的高校逐渐被“国立化”。私立大学的情况比较复杂, 很多学校名义上虽是私立, 校董、校长和校友却多是政界要人, 与党国渊源甚深。比如, 复旦大学早年便因“总理欣赏师生笃信主义, 亲任校董会主席, 命陈英士、于右任、王宠惠等为校董”。其后, 孙科、叶楚伦、邵力子、程天放等都成为校董, 真正将复旦当成自己的事业, 经常在中央替学校争取经费。^⑤ 大夏大学与党国亦有渊源, 校董包括何应钦、孙科、吴铁城、许世英、王正廷、张嘉璈等党国要人, 校长王伯群为现任中央常委、国府委员。^⑥ 由此, 陈立夫曾特拨 1 万元帮助复旦、大夏联合西迁。^⑦ 其后, 又拨款 20 万元资助复旦大夏第二联大在贵阳建校。^⑧ 两校内迁, 基本未依靠地方势力。

光华的情况与复旦、大夏不同。抗战前, 光华的校董中没有任何党国要人, 校长张寿镛也已致

① 当光华遭遇困顿时, 张寿镛一度有让翁文灏掌管学校之意, 翁文灏告知“决不能任”。参见李学通、刘萍、翁心存整理《翁文灏日记》下, 1941 年 2 月 11 日, 中华书局 2014 年版, 第 632 页。

② 关于 CC 系与政学系、朱家骅系的斗争, 参见王奇生《党员、党权与党争: 1924—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》,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年版, 第 317—355 页。

③ 《校董题名》, 《私立光华大学暨附属中、小学教职员录》,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 1941 年编印, 第 3—4 页。

④ 《成都分部十年大事记》, 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 第 61 页。

⑤ 《孙科请求补助上海私立复旦大学常年经费案》(1937 年 2 月), 台北,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, 会议档案 5. 2/157/15。

⑥ 冯正仪《无限深情怀念王校长伯群》, 《学府纪闻·私立大夏大学》, 台北, 南京出版公司 1982 年版, 第 40—45 页。

⑦ 陈立夫《成败之鉴: 陈立夫回忆录》, 台北, 正中书局 1994 年版, 第 238、337 页。

⑧ 娄丞菲主编《大夏大学编年事辑》上, 1937 年 11 月 8 日,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, 第 410 页。

仕。光华本身也颇为注重学校的独立性,拒绝教育部合并西迁的命令便是一例。其后校产被毁,在成都兴建分部,才有意识地寻求中央支持。然而,孔祥熙、翁文灏、朱家骅等或与学校渊源不深,或能力有限。光华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更无渊源,无法获得后者的一视同仁。光华只能与地方势力合作,依靠地方资金办学。因此,光华大学成都分部虽属内迁高校,由光华旧人全权主持,实际自内迁起便与地方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。此种密切关联,为日后的矛盾与斗争埋下了伏笔。

二、财政危机与教育部的消极支持

私立大学的校董会一般负责募集经费、选聘校长、决定大政方针、审订校章等,对具体的日常行政事务无权干涉。^①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实际主事者是谢霖、薛迪靖、李恩廉、陆寿长、胡毓杰、伍丹戈等光华旧人。因此,川籍校董对学校的资助仅限于建校初期,对后续办学经费再无任何资助。学校的日常花销,完全依靠学费。成都分部各项开支一切从简,谢霖之下,仅设秘书一人;教务方面设教务长一人,注册主任一人,工作人员七人;总务方面设总务长一人,工作人员四人;训导方面设管理员两人;院系方面院长、系主任各一人,没有工作人员。^② 谢霖一人在校身兼数职,却不支薪水与车马费,只以教授标准按上课钟点领薪,且常自行垫经费。^③ 尽管如此,学校每月仍要靠借债度日。

光华靠借贷办学,除了经济基础薄弱,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外,更有战时通货膨胀、物价剧烈上升的因素。战时军费开支巨大,政府税收财源枯竭,财政出现惊人赤字,相应导致教育经费的严重压缩。同时,为满足政府支出需要,国家银行大量发行钞票,导致法币持续贬值,物价无止境上涨,在大后方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,民众陷入普遍的经济贫困,购买力下降,支付教育费用乏力。^④ 战时国穷与民困的双重压迫,对大后方各校几乎造成普遍化的影响,对迁移而来、缺乏稳定财政来源的私立大学而言,冲击尤其巨大。由于教育部对各私立大学的补助政策并不平等,标准常视与教育部部长个人的关系亲疏而定,更使光华陷入远较其他私校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。

按照教育部的规定,光华每年只能获得4万元的常规补助。在不断上涨的物价面前,4万元实为杯水车薪。光华校方遂求助于教育部给予特殊补助。1939年8月,“光华大学移川复兴建设委员会”名誉委员长孔祥熙在重庆召集委员商议补助办法,议决由张寿镛和谢霖联名请求,再由校董会集体致函教育部,请求补助校园扩充费。经过孔祥熙、朱家骅、翁文灏在行政院的努力,教育部于10月决定特别补助光华大学8万元。^⑤ 不过,这8万元只是特别补助,并非常规补助,对开支庞大的学校而言远远不足。

1940年3月,光华沪蓉两校联合呈文教育部请求援助。其文称,两校常年收支不抵,每年需款10万元以上,教材设备每月均需垫付两万元以上,而今物价飞涨,教职员待遇又需增加,学生的学费负担已经无法再重,希望按照援助复旦大学(每年28万元)、大夏大学(每年17万元)的标准,补助两校共

^① 《光华大学董事会章程》,台北,“国史馆”藏,教育部档案·光华大学立案 019/0000008/43A。

^② 莫健《上海光华大学内迁成都》,全国政协、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《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,第305页。

^③ 绿扬《我国会计事业的先驱者谢霖先生》,光华大学校友会编《光华的足迹——光华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集》,华东师范大学1995年印,第49页。

^④ 有学者统计,战前法币1元的购买力,在1938年底值0.6元,1939年值0.28元,1940年只值0.08元。也就是说,到1940年,12.5元法币仅合战前的1元。参见石源华、金光耀、石建国《中华民国史》第10卷,中华书局2011年版,第220—222页。

^⑤ 李学通、刘萍、翁心存整理《翁文灏日记》上,1939年8月22日、10月17日,第374、398页。

24 万元以填补亏空。张寿镛同时致电朱家骅,请求他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关说。^①然而,如前文所言,光华和陈立夫素无渊源,无法获得与复旦、大夏的同等待遇。由于朱家骅与陈立夫虽表面和睦实分庭抗礼,此种请求甚至可能会有所折扣。陈立夫当即以“本年度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总额未见增加”为由拒绝,只允许在原 4 万元的基础上加拨 5 千元作为沪蓉两校全年常规补助。^②

1940 年秋,成都的物价较之 1938 年春开办时增长一倍,成都全体中学教职员由于经费无着,均已罢教停课。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时有大学生 600 余人,中学生 400 余人,大中学教职员百余人,因请求补助未能如愿,马上在通货膨胀之下陷入险境。以 1940 年上半年为例,在教授待遇已削减至极低的情况下,学校亏损额达 6 万元之巨,“各处挪借已竭,无法再行周转,下半年之亏短当更增多”。谢霖曾于 1940 年年中单独向教育部提交请求,希望从 1941 年起,每年补助成都分部 18 万元,并于 11 月再度上书请求教育部允准提前拨款 5—6 万元以解燃眉之急。^③请求再为陈立夫所拒,只允在原 4.5 万元的基础上加拨 8 万元,共 12.5 万元由沪蓉两校均分。最终,蓉校只分得 6.5 万元,与谢霖按照预算呈请的 18 万元显然有较大距离。^④

此时,教育部对复旦、大夏的补助已经增加到 30 万元和 25 万元。即使如此标准,对两校来说仍不敷用。然而,1941 年末,复旦奉命改为国立,一次性获得政府补助 120 万元,马上脱离经济险境。^⑤大夏亦于 1942 年获得政府允准改为国立,只是校方不愿接受地方性的“国立贵州大学”校名而未改^⑥,转由教育部补助 50 万元经费。^⑦张寿镛、谢霖唯恐申请改制国立失去办学自主权,只以私校的身份不断呈请补助。1940 年 12 月,谢霖再度托朱家骅向陈立夫关说,希望考虑增加对学校的补助,并请求按月发放,以免继续借贷。^⑧然而,请求非但未得回复,成都分部反而于 1941 年春收到蒋介石指示教育部命令停办的公文。

公文称,有校中三青团向蒋介石告发,共产党员在校内“猖獗活动”;又有人向宋美龄告发,光华受宋主办“战时儿童保育会”委托收纳难童的保育院,学生行为不正。^⑨所谓共产学生生活的指控,并非捕风捉影。成都分部在 1940 年前便有地下党活动,当时中共党员向晓、李仁宇、罗秉文通过光华同学何光璃在校内出版了左倾文艺刊物。国民党成都行辕为此曾特召何光璃谈话,并勒令刊物停止出版。其后,地下组织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成员张光苍、许可等考入光华,与何光璃合作重新办刊并组织壁报《原道》,与三青团主办的壁报《青光》对垒,招致三青团干事长谢乐康训斥。^⑩收到公文后,谢霖亲赴重庆希望向陈立夫解释,但未获接见。其后,经翁文灏、朱家骅等在蒋

① 《张寿镛致朱家骅电》(1940 年 3 月 14 日),台北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,朱家骅档案·私立光华大学,301/01/09/198/3—4。

② 《陈立夫致朱家骅函》(1940 年 4 月 1 日),台北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,朱家骅档案·私立光华大学,301/01/09/198/12。

③ 《照抄上教育部电》(1940 年 11 月 7 日),台北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,朱家骅档案·私立光华大学,301/01/09/198/18—19。

④ 《陈立夫致朱家骅函》(1940 年 12 月 11 日),台北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,朱家骅档案·私立光华大学,301/01/09/198/23—24。

⑤ 复旦大学档案馆编《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,第 1—2 页。

⑥ 《大夏大学请缓合并于贵大原因转呈鉴核》(1943 年 7 月 29 日),台北,“国史馆”藏,国民政府档案·大专院校设立改组,001/000006/186A。

⑦ 娄忞菲主编《大夏大学编年事辑》下,1942 年 5 月 7 日,第 533 页。

⑧ 《谢霖南乞转商教育部增加明年补助费并自一月起逐月发付》(1940 年 12 月 31 日),台北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,朱家骅档案·私立光华大学,301/01/09/198/35。

⑨ 李学通、刘萍、翁心存整理《翁文灏日记》下,1941 年 2 月 11 日,第 632—633 页。

⑩ 《光华、成华大学“民协”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》(1984 年 11 月 8 日),出版社不详,第 1 页。

介石处关说,才获得谅解。教育部收回停办的命令,但令其“暂缓招生,切实整理”。^①

成都分部本已身陷财政危机,日常运作完全仰赖学费,年底便将招生广告登载于各报。如今教育部非但不予增加补助,反令其暂缓招生,无异于彻底断其财源,使原本处于险境的学校有瓦解之虞。经朱家骅、翁文灏等人继续调解,教育部允其暂时招生,但责令停办化学系及土木专修科。由于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,谢霖于1940年冬增加补助并按月发放的请求,被教育部以“补助费早经函请财部分汇,未便变更”为由拒绝。最后,由孔祥熙出面与教育部协商,从追加私立各校100万元救济费中,分拨7万元给成都分部。^②

1941年末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在日军的封锁下,对外交通全部断绝,外援物资无法接济,大后方的通货膨胀原本缓慢增长,从此转变为激烈猛涨,物价不可遏制。以最能反映物价的米价为例,1940年11月,粮食部售给成都市场的平价米每石200元,1943年上半年涨到340元,8月已经增长为每石680元。至于市场上的普通货物,均较之1943年上半年上涨三倍左右。成都各中学已经将学费从上半年的295元调整为1300元。由于教育部依旧消极资助,光华只能按照正常的物价标准调整学费,从1943年上半年的850元上涨为1900元。^③未料此举竟在校内引发学潮。

三、学潮的台前与幕后

1943年8月31日,有学生莫健等五人,前往谒见川籍校董张仲铭、向传义,认为学费太重无法负担,校中师资不良必须改进,要求谢霖辞职并整顿学校。随即,闹事学生强迫全体同学罢课,在校内张贴《欢送谢霖先生离开光华以娱晚年》、《拥护校董会允许谢霖辞职》等大字报,并乘校董张仲铭到校之际召开演说会煽动。^④随后学生兵分数路,有人专门招待新闻记者,请各报帮助声讨谢霖以宣传壮其声势。^⑤又有学生至张澜、但懋辛、熊克武等川籍国民参政会议员处寻求支持,请其致电教育部要求饬令谢霖。张澜等听从其请,集体致电教育部声援学生。另有学生募集资金,拟去重庆教育部请愿。谢霖派校警干预请愿学生,双方发生纠纷,校警被迫鸣枪示警,学生首领莫健失踪(后证明系自行隐藏诬陷谢霖),学潮逐步进入激化状态。

据莫健回忆,此次学潮的组织者,尚有贾仲仙、袁鸿英、李官林、郑德禄、张敏、旷正元、李顺天等七人,除了反对光华提高学费,还反对谢霖对校内国民党与三青团滥抓学生、肆意活动的行为听之任之,不加阻止。^⑥然而,从档案资料来看,此种说法实为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标榜“政治正确性”的说法,未必可信。有回忆称,谢霖曾经拍案斥责三青团长谢乐康干涉学校事务,并迫使其最终离校。^⑦从资料来看,莫健其后曾竞选成为国大代表,并非共产党。^⑧如果反对国民党,他们更不会选择向教育部申诉。在校方看来,学生闹事亦另有隐情,实因学潮之前,XX(疑为莫健)与女生XX校园恋爱,女生家长来校面见谢霖,声明将女生领回,不许与XX往来,谢霖自然同意。1943年夏期

① 李学通、刘萍、翁心存整理《翁文灏日记》下,1941年2月11日,第632—633页。

② 《陈立夫致朱家骅函》(1941年3月8日),台北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,朱家骅档案·私立光华大学,301/01/09/198/53—54。

③ 《成都分部三十二年秋学潮之始终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27—29页。

④ 《成都分部三十二年秋学潮之始终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30页。

⑤ 《光华大学学生暑假留校学生代表,定今日下午四时,在荣乐园招待新闻界》,成都《新民报》,1943年9月6日,第4版。

⑥ 莫健《上海光华大学内迁成都》,全国政协、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《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》,第303页。

⑦ 雷瑶芝《忆谢霖老师》,西南财经大学志编写组编《西南财经大学志》第1卷,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,第48页。

⑧ 莫健《我在独山县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的经过》,《贵阳文史资料选辑》第34辑,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编印,第165—173页。

未考试时,XX旷考,理应获得留级处分。XX由于怀恨谢霖,遂以新学费高昂为借口发动学潮。^①此种理由出于光华校方的公开出版物,应有理据,却也并非全部真相。

光华校方的文件在回顾此事时多次用“策动者别有用心”“此外究竟有何背景”“学生受愚”等欲言又止之语暗示,此事背后有某些要人的支持。当时的亲历者孙恭也回忆,“此次学潮,是排挤谢霖的一幕闹剧”,只是“不知幕后主使者,未便妄议”。^②从实际情况看,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长、校董向传义的支持。学生最初就此事拜访向传义,对方表示对学生的主张,“并不反对”。^③不过,向传义亦无能力解决财政难题,学生只能自行向中央方面申诉。不久,学生以“光华大学全体学生之名”上书行政院,控诉光华“我校校政衰败,学费奇重,早为主席(蒋介石)所洞悉,乃事迭出,不幸谢副校长霖枪击学生,以致代表莫健失踪,群情愤慨,莫所归依,不得不有渎职。请飭教育部迅予接管并惩治凶顽,以维教育大业,以张法纪。”^④

教育部责令,光华按照1943年上学期的850元标准征收学费,并认为此事系私立大学内部问题,须由校董会解决,不予受理。教育部的态度实值得玩味,从表面上看貌似尊重私立大学的自主权,实则未必。抗战前复旦发生学潮,教育部曾直接介入并改组学校,令校长李登辉“请假休养”,使复旦进一步归附中央。^⑤陈立夫所谓的“由校董会解决”,实际是乐见其乱,认为光华素来不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,既然依附朱家骅,应请其帮助解决。学生不得要领,集体上书朱家骅,请求接见并“根本救治”。然而,朱家骅亦无法解决光华的经济困境,仅令属员告诫学生安心读书,未允接见。^⑥

由于陈立夫和教育部所代表的“中央”不予受理,朱家骅所代表的“中央”无能为力,此次学潮只能转由“地方”来解决。从事实来看,地方势力愿意解决此事,但出于“尊重”朱家骅、翁文灏的权威以及张寿鏞的地位,并不直接表态。10月6日,学生归来后再度受到向传义的接见,谈五小时。向传义表面上表示“改革校政问题,殊难全权负责”,但并不反对学生要求的“彻底改革”。^⑦不过,川籍校董不愿垫付经费,预算若以每生850元收费,至1943年下半年亏空必将达到100万元之巨,决定将学费定为1700元,余下亏空呈请教育部补助。^⑧教育部拒绝补助,学校陷入长期混乱。闹事学生拒绝开学,要求谢霖辞职。

实际上,请愿学生虽僭越“全体学生”之名,却无法真正代表学生全体,甚至不能代表大多数学生。谢霖为学校倾注一腔心血,且清正廉洁、爱护学生,很多学生都对其表示拥戴。如当年的学生回忆,“对1943年的学潮,多数学生是不赞同的,对谢师是钦佩的。他两袖清风,还不时资助经济困难的教职员和学生。因此,1943年冬天,几百名师生在成都东胜利街沙利文礼堂为其庆祝六十寿辰,许多师生在会上发言,祝颂谢师的办学功绩,师生之情,水乳交融,气氛至为感人。”^⑨当时还有“光华护校同学会”发出启事,希望闹事的少数同学能够理解学校经济困顿的苦衷,通过其他办法

① 《摘录卅二年秋学潮文件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31页。

② 孙恭《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简史》,《金牛文史资料选辑》第1辑,成都市金牛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1984年编印,第64页。

③ 《成都分部三十二年秋学潮之始终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30页。

④ 《光华大学学生控副校长谢霖枪击学生代表莫健失踪》,台北,“国史馆”藏,国民政府档案·大学学潮案,001/000006/168A。

⑤ 复旦大学档案馆编《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》,第1—2页。

⑥ 《光华学生代表上朱家骅书》(1943年10月2日),台北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,朱家骅档案·私立光华大学,301/01/09/198/66。

⑦ 《摘录卅二年秋学潮文件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34页。

⑧ 《邓汉祥致朱家骅函》(日期不详),台北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,朱家骅档案·私立光华大学,301/01/09/198/69—70。

⑨ 雷瑶芝《忆谢霖老师》,西南财经大学志编写组编《西南财经大学志》第1卷,第48页。

解决此事,勿受外界的蛊惑,执意反对校长,以造成不可收拾之局。^①

谢霖对权位并无恋栈,为使学校恢复秩序,同意卸任副校长之职。但是,他受张寿镛全权委托在蓉办学,肩负着全体光华同人在大后方传承光华火种、复兴光华精神的希望。张寿镛当年为获得川省人士的捐助,声明今后学校将“永久留川”,但并非“永远赠川”,未真正确定学校的未来归属。何况很多学校都曾有此承诺,如复旦曾声称“迁移入川并非临时性质,拟有永久计划,将在此地建校。即他日战平,亦不舍今址而回海上,此点与他校之迁入内地者不同。”^②这多半可以理解为某种安抚地方人士的权宜之语。如果谢霖轻易卸职,请他人办理,实为将光华拱手送人,前途如何殊难预料。而且,由于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军占领租界,光华沪校为避免向汪伪登记,已被迫关闭。成都分部作为战时唯一能公开代表光华的办学机构,必须使其不出任何差错,以保证学统的传承。谢霖等决议,聘请1929级教育系校友——四川大学新生院院长张登寿担任校长并马上颁发聘书。

此消息一出,校内马上出现标语与大字报,呼吁抵制张登寿来校。拥护张登寿、希望调解矛盾的光华旧人胡毓杰、伍丹戈,被闹事学生包围质问并以武力强行驱赶离开学校。张登寿本已接收聘书,决计为母校服务,但随即有自称学生代表者上门挡驾,阻拦其接受聘书。莫健回忆称,张登寿是陈立夫的学生、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的亲信,执掌学校必将进一步党化学校。^③然而,此事在张登寿处却别有说法。经过进一步了解,张登寿方知“当地有个地霸型的实力人物在此力争此席”。张登寿作为外来闽籍人士,不愿开罪四川地方实力派,遂以川大开学无法脱身为由,拖延不就。^④谢霖急以大义责令原教务长薛迪靖必须回蓉掌校,薛迪靖虽返,却已双目失明,无法担当重任。

四、地方势力的出场

对于这次学潮,无论身在中央的孔祥熙、朱家骅、翁文灏,还是远在上海的张寿镛,都鞭长莫及。真正能够掌握局面者,是成都分部的川籍校董。谢霖受阻被迫辞职,张登寿无法上任,川籍校董开始酝酿新的主事者。1943年10月7日,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校董会在邓锡侯家中召开第六次会议,以邓锡侯为主席,参加者有向传义、李肇甫、张仲铭、康心之、薛迪靖和谢霖等六人。除谢霖、薛迪靖外,其余均为川籍。校董会议决,张登寿来校之期未定,暂由校董向传义全权代理校务。^⑤10月25日,校董会再度开会,公推邓锡侯为校董会主席,决定学费按照1700元标准收取,不能再减。

1943年11月1日,向传义正式接管校务并发布公告,宣布仍向每位学生收取1700元。此数字仅比谢霖制定的标准少200元,然闹事学生“俱愿遵从”,无人表示异议,光华迅速恢复秩序。少数同学闹事,多数同学反对,却使学潮动荡两月有余。校方文件所说的“学生受惠”,亲历者孙恭所说的“幕后主使者”,张登寿所说的“地霸型的实力人物在此力争此席”等等,情况如何,似已可知。当然,向传义也并非终极幕后。时任光华教授的萧公权曾亲历学潮,回忆抗战胜利后向传义将学校交给邓锡侯,“卸除代理校长的职务,非常高兴”。^⑥这说明,向传义也只是四川地方势力推出的代管

① 《摘录卅二年秋学潮文件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32—33页。

② 费汎《吴南轩副校长在复旦同学会上的报告》,复旦大学档案馆编《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》,第32页。

③ 莫健《上海光华大学内迁成都》,全国政协、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《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》,第304页。

④ 张登寿《八旬回首》,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福建文史资料选编》第1辑,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,第566页。

⑤ 《光华大学校董会决议录(第六次)》(1943年10月7日),台北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,朱家骅档案·私立光华大学,301/01/09/198/85—86。

⑥ 萧公权《问学谏往录:萧公权治学漫忆》,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,第154页。

者而已。

8日,成都分部举行开学典礼,向传义任主席,谢霖以普通教授的身份参加,并且印发了《告肄业同学书》。谢霖回顾了本年物价疯狂上涨的情况,列举了学校各项收入支出分配,以证明在教育部消极支持,物价已经上涨数倍的情况下,学费同比例增加的合理性。同时,谢霖从师资、训育、管理等各方面来证明,光华成都分部虽然在困顿之中却仍做出巨大成绩,以反驳学生“师资不良”的指责。在谢霖看来,学生无疑“受人愚弄、受人利用、疏愚无识、悖谬妄行”,以学费为借口肆意告状并驱逐校长。当校方酝酿以张登寿为主任,学生又“受人愚弄,任意反对,甚有借口教师中之胡毓杰伍丹戈两校友系属拥张分子,胁迫其离校,率意妄行,狂惑悖乱”实为“光华之大耻辱”。对于向传义,谢霖评价道“育仁先生,经济力量,比较本人,何啻天壤,相信必能另有筹款方法,此为学校及诸生之福。”^①此语表面看似赞扬向传义,实际却饱含不满、不甘之意。

向传义代管光华期间,进一步排挤谢霖等旧人。1943年12月,向传义主张加聘校董,引荐更多川籍人士进入校董会。^②1944年7月2日,邓锡侯被推举为光华大学成都分部董事长。^③1945年2月,向传义以经费困难为名,决定停办附属光华小学。该小学由谢霖首创,属公益性质,意在帮助学校附近的贫困工农儿童入学读书。谢霖以停办公益小学与私立大学服务社会的精神相悖,未能同意。最后,谢霖决定自行担负起学校费用,改为私立光华小学,亲自担任董事长。^④

此次变故,实为光华大学历史上的一次断裂。从此,校政大权从谢霖、薛迪靖、李恩廉、陆寿长、胡毓杰、伍丹戈等光华旧人手中,完全转移到以邓锡侯、向传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之手。此种转移,背后隐约浮现着某种地域矛盾和权力之争。通过王东杰的研究可知,四川地方省籍观念颇重。尤其是1935年中央军入川,抗战爆发后中央政府迁渝以后,四川原本四分五裂的地方势力开始一致对外,对中央在川的势力扩张表示警惕,多有“川人治川”之议。在一般观念中,四川的大学,校长亦应由本省人来担任。由此,1938年教育部任命代表中央的外省人程天放担任四川大学校长,激起成都士绅的激烈反抗,此举亦得到了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的“暗中同情”。^⑤然而,川大最终被“国立化”,不容川省人士插足;省立重庆大学亦被改为国立重庆大学,摆脱刘湘系的控制。面对中央不断侵夺地方教育资源,如何掌握教育权力,维护川人的尊严,直接或间接与强大的中央抗衡,始终是川省实力派的焦虑。

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主客观条件,恰恰为地方势力提供了某种机会。光华大学不受教育部重视,并非因其私立大学的身份,而是因它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“中央”毫无渊源,抗战后选择依附朱家骅、翁文灏,更被视为后者的势力范围。因此,素来针对地方渗透教育权力的陈立夫和教育部,对光华学潮采取坐视不理的态度。朱家骅、翁文灏的“中央”又无法给予光华实质性支持,对地方势力的争夺也无能为力。对地方势力来说,光华脱胎于被誉为“东方哈佛”的圣约翰大学^⑥,如能完全掌握,成为一所真正属于四川人的大学,既可与控制川大、重大的中央对峙,也是某种有价值的教

① 《摘录卅二年秋学潮文件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38页。

② 《摘录卅二年秋学潮文件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40页。

③ 从后续事实来看,邓锡侯确实将学校当成不容他人侵犯的势力范围。1947年9月,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已改为成华大学,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内发动学潮,试图控制成华。邓锡侯称“他们不喜欢我们办大学嘛,这是意料中事。”参见吕振修《私立成华大学创办及发生学潮的回忆》,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成都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9辑,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,第287页。

④ 《附属小学之改组独立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56页。

⑤ 王东杰《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: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(1925—1939)》,第265—266页。

⑥ 张仲礼《〈圣约翰大学史〉序》,熊月之、周武主编《圣约翰大学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,第1页。

育资源或文化资本。^①而且,光华的建校基地与资金多由川省捐赠,校董中亦多川省人士,学生大半川籍,但该校从名义上仅是上海一所私立大学的迁川机构,校政由光华旧人主持,地方势力无法染指。此次学潮发生,即使最初因收费而起,却给川省地方实力派以暗示,使其捕捉到机会,支持学生并从幕后走向前台,排斥外省人谢霖、张登寿,顺利接管成都分部。

1945年夏,抗战胜利。教育部要求大学在非战时不可设置分校,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之去向实应考虑。经过1943年秋的学潮与学校改组,成都分部已经被地方势力实质控制,形同独立。光华旧人决定另起炉灶,于10月11日在重庆召开会议,宣布以朱经农为校长,并重组校董会,推王费佩翠(建校发起人王省三妻)、朱经农(原副校长)、朱公瑾(原副校长)、徐可燦(光华校友,朱家骅亲信)、许秋帆(建校发起人,原董事)、张星联(张寿镛之子)、翁文灏(张寿镛亲家)、赵晋卿(建校发起人,原董事)、廖世承(原副校长)、钱永铭(建校发起人,原董事)、颜任光(原副校长)、谢霖(原副校长)等为校董,并推翁文灏为董事长,谢霖、钱永铭为常务校董。光华旧人开始在川渝募集基金,谋求上海复校。对于成都分部,在川省人士未决定接办之前,以向传义暂为成都分部主任,报部备案。10月30日,川省人士正式决定接办,公推邓锡侯为代表处理接管事宜,更校名为“私立成华大学”。^②

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全部校产,包括土地、房屋、仪器设备、图书等总估价1.5亿元,全部归私立成华大学所有。成华大学随即组建了新的校董会,以董事长邓锡侯、副董事长刘文辉之名,对光华校董会的善举表示致谢:

贵校在川所设分部,有贵会暨张故校长寿镛先生主持于前,谢霖副校长实行入川创办于后,在此抗战八年之中,不特有益于战区避难学子,且于后方青年,造就亦至宏大,证以八年内毕业之大中两部学生一千四百余人之中,川籍学生,约占十分之六,而目下在校之大中学生一千九百余人中,川籍学生,又约占十分之九,足见斯校关于川省高等教育,颇为重大,曷胜钦感?现在贵会已议决移由川省地方人士接办,同人等为国家造才,为桑梓兴学,理应接受,并应逐渐扩充,成为川中一个完全大学,作为永久纪念。……敝校即于二月一日成立,嗣后仍当萧规曹随,与贵校分立于扬子江上下游,成为兄弟学校,效力邦国,还祈赐教,以匡不逮。^③

光华大学成都分部,从此完全转变成一所“地方化”的学校。

五、结语

抗战时期,播迁内地的国立大学,办学经费来源于中央,不必仰息于地方社会。抗战胜利后,各国立大学基本整体返回原地,并未被“地方化”。私立大学如复旦、大夏两校,校董和校长多是党国要人,向来亲和于政府,能够得到中央的扶持,甚至可以改制国立。这些私校亦无需逢迎地方势力,胜利后也整体复校。如光华这样与党国关系较远,经济实力微弱的私立大学,若要内迁后方,除了

^① 历史与现实非常相似,如今四川教育界仍然重视“光华”之名。由成华大学与16所财经院或系科合并而成的四川财经大学,近年将历史沿革追溯到光华大学,将建校日期由1952年更改为1925年上海光华大学成立,并以“光华继承者”的身份,计划修复光华遗迹,树立张寿镛铜像,打造光华文化。真正继承光华大学主体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,则津津乐道于“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”的红色身份,很少提及其前身私立光华大学的校史。

^② 《成都分部十年大事记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64—66页。

^③ 《抄录成华大学来函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41—42页。

临时在中央寻求支持外,只能依靠地方实力派,走一条与地方势力合作的办学之路。然而,此举如一把双刃剑,使学校自诞生起便与地方社会密切关联,易于被“地方化”。

对强势的中央而言,抗战中一直试图从地方势力手中夺取教育资源,将地方大学“国立化”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中央并不希望内迁高校“地方化”。然而,所谓的“中央”并非铁板一块。光华以江浙大中资产阶级为支撑,与陈立夫和教育部代表的“中央”毫无渊源。抗战中出于寻求财政支持的目的,才亲和于以朱家骅、翁文灏为代表的“中央”。由于陈立夫和朱家骅、翁文灏等虽表面和谐却暗中竞争,教育部一直在财政上对光华消极支持。面对光华学潮,教育部更采取坐视不理的态度,乐于学校被“地方化”。朱家骅、翁文灏无法给予学校实质性帮助,亦只能坐视学校被“地方化”。

对省籍意识极强的地方势力而言,办大学意味着既可以为个人培养“亲信子弟兵”,又可以在“文化竞争”上不后于人。面对中央不断从地方手中侵夺教育权力,正面抵抗无果后,一直试图通过其他手段掌握教育资源,以直接或间接与强势的中央抗衡。光华大学在战前的规模、声望和影响,对地方势力而言实为某种有价值的教育资源。若能完全掌握光华,即使未必能直接与被中央控制的川大、重大对峙,至少可以成为“川人治川”在教育领域的某种实现,亦可间接成为某种象征性的文化资本。不过,地方势力并不选择直接与学校当局冲突,只是以学潮为契机,逐步介入校政,并实现实质性掌控。此种手法无论对中央的朱家骅、翁文灏,还是上海的张寿镛,都可以维持一种表面的“尊重”。

对光华当局而言,可谓彻底失败。由于缺乏坚实的政治后盾和经济支撑,光华直接或间接成为中央内部、中央与地方斗争的牺牲品,只能将校产全部送人,回到上海白手起家。此种“校产赠送”,当然合于建校时张寿镛“永久留川”的美意。然而,此语多似权宜,复旦等校都曾有过类似“永久留川”的承诺,抗战结束后却全部整体迁回原地。光华最终“永久留川”,看似出于慷慨支援内地教育的伟大友谊,实际是校政大权早被川籍地方势力夺取,无可奈何的被迫之举。

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“地方化”,与地方高校的“国立化”路径完全相反,虽然主客体不完全相同,却同样是中央、地方以及内迁高校三方矛盾和斗争的折射,为观察战时中央与地方以及内迁高校三者关系,提供了一扇新的窗口。不过,教育的宗旨在于造福社会,权力究竟掌握于谁人之手或不重要。正如曾经允诺抗战胜利后学校“永久留川”的张寿镛事后的评价:“教育事业,学问为尤,吾辈自觉已尽能事,学生确有所得,即告无罪于天下,况战争未息,人民尚在流离颠沛之中,对于流亡事业,尚能求全责备乎?”^①或许,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家精神。

(作者韩成,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)

(责任编辑:马晓娟)

^① 《摘录卅二年秋学潮文件》,《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》,第31页。